

台灣地方層級社會抗議之解析（1992～2008）：一個政治機會結構的觀點*

蘇彥斌

政治大學
政治學系
副教授

吳親恩

中央研究院
政治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摘要

社會抗爭在台灣政治變遷的過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過去關於台灣社會運動的文獻大多為質化案例研究，卻很少有研究解釋為何台灣有些地區較常發生社會抗爭，而有些地區卻不常出現抗爭。為了補充相關文獻的不足，本研究利用一個獨特的抗議事件資料庫，採取政治機會結構論的視角，解析台灣各縣市為何會有不同的抗爭頻率。本研究的實證分析顯示：第一，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民進黨執政的縣市較常發生地方抗議事件；第二，各縣市的地方抗議在選舉年時，會有較高的發生頻率；第三，民進黨籍縣市議員當選的比例，對於地方抗議事件的頻率沒有顯著的影響。總結而言，本研究為台灣公民社會的發展提出更細膩的解釋，同時也對新興民主國家的政治過程提出更深刻的理解。

關鍵字：社會運動、地方抗議、政治機會結構、民主進步黨、選舉周期

* 收稿日期：104年9月9日；修回日期：105年5月13日；接受刊登日期：105年10月12日。

壹、前言

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社會運動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推進角色。然而，社會抗議事件為何會發生，其發生的頻率為何會因時因地而有所差異，在學界仍有很大的爭辯。先前關於台灣社會運動的文獻，大多為個案研究，將討論焦點置於單一社會運動的興起與轉型的過程，例如勞工運動（何明修 2008; Huang 2003）、婦女運動（范雲 2010; 黃長玲 2008）、環境運動（何明修 2006; Ho 2011）、學生運動（蕭遠 2011; Ho 2015）、反核運動（Ho 2014; 2003）、同志運動（朱偉誠 2009; 賴鈺麟 2003）、社區運動（何明修 2010; 林秀幸 1997）、原住民運動（黃鈴華 2005; Hsieh 2006）等。這些研究採用質化分析途徑，為特定社會運動的過程提供詳實的描述與分析。然而，目前卻很少有研究從較為宏觀的角度解釋為何台灣有些地區較常發生社會抗爭，而有些地區卻不常出現抗爭。

相對而言，社會運動的量化研究文獻常以跨國大樣本的研究設計，探討各種總體因素對於社會抗議的影響，這些因素包括：政府的經濟表現（Quaranta 2016）、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Roberts 2008）、經濟發展程度（Arce 2010）、民主化程度（Schatzman 2005）等。這些研究雖然有助於評估特定理論的通則化程度，同時也能有效評估不同解釋因素的相對重要性，但因為這些著作大多以「國家」為分析單位，因此，其實證分析結果往往無法充分解釋為何一國的抗爭事件頻率會有地區上的差異。

如果我們只利用全國抗議事件之加總資料進行分析，必然會忽略不同次級行政區（sub-national units）抗議事件發生頻率的差異。例如，表一顯示，在 1992 年到 2008 年這段期間，台灣每個縣市平均每年會發生約 19 件以地方議題為訴求的抗爭

事件，但如果光看這個數字，並無法讓我們得知各縣市間抗議事件數的差異，例如台北市的年均地方抗議事件數為 58 件，而台北縣卻只有 37 件。同樣的，表二顯示全台灣的地方層級抗議事件數自 1998 年的 5 件，到 2003 年的 24 件，一直到 2008 年的 31 件，長期以來似乎有逐漸上升的趨勢。然而，如果光看這樣的趨勢，並無法得知在地方層次資料的變化，例如相較於台中市與高雄市，台北市的抗議數有先減少後增多的趨勢。

表一 台灣各縣市地方抗議事件發生頻率的年平均數（1992～2008）

彰化縣	20.8	金門縣	2.3	台南縣	24.1
嘉義市	4.4	連江縣	0.6	台北市	58.2
嘉義縣	17.3	苗栗縣	19.2	台北縣	37.0
新竹市	6.2	南投縣	17.9	台東縣	8.1
新竹縣	17.6	澎湖縣	4.2	桃園縣	35.6
花蓮縣	16.6	屏東縣	15.2	宜蘭縣	24.9
高雄市	19.8	台中市	15.5	雲林縣	30.7
高雄縣	25.1	台中縣	32.2	各縣市平均	19.2
基隆市	18.1	台南市	9.0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Wu 和 Chu（2010）。

表二 台北市、台中市與高雄市地方議題抗議事件數的比較

年份	全台各縣市地方 抗議事件平均數	台北市地方抗 議事件平均數	台中市地方抗 議事件平均數	高雄市地方抗 議事件平均數
1998	5	59	4	6
2003	23	30	24	38
2008	31	92	21	39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Wu 和 Chu（2010）。

表一和表二顯示台灣地方層級抗議事件的發生頻率，因時因地而異。從這個事實出發，本文所要探討的研究問題為：為何台灣有些縣市發生較多社會抗議事件，而有些則較少？爲了回答這個問題，本文採取政治機會結構論的角度，對於地方抗爭事件的頻率進行解釋。本研究的實證分析結果顯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民進黨在中央執政時，全台各縣市較常會發生地方抗議事件。第二，民進黨執政的縣市較常發生地方抗議事件。第三，若比較「民進黨是否在中央執政」以及「民進黨是否在地方執政」的不同政治機會結構組合對於地方抗爭的影響，我們發現民進黨在中央執政時期裡由民進黨所執政的縣市，會發生最多的抗議事件，而國民黨在中央執政時期裡由國民黨（或無黨籍）人士所執政的縣市，則發生最少的抗議事件。第四，各縣市的地方抗爭在總統選舉年以及地方首長選舉年時，會有較高的發生頻率。總而言之，本研究的獨特之處在於透過地方社會抗議事件的系統性分析，從不同的分析層次來驗證政治機會論的邏輯是否能運用在對於地方抗議事件的解釋，回答了「為何國內各縣市的地方抗議頻率會有所不同」這個問題。本文爲台灣社會運動的發展提出更細膩的解釋，並對於新興民主國家的政治過程提出較深刻的理解。

貳、台灣的國家、政黨與社會運動

台灣公民社會長期以來因爲中國國民黨高壓統治的關係，曾有很長一段時間缺乏組織力量。直到 1970 年代末期，以地下異議政論雜誌爲平台的黨外運動，慢慢帶動台灣公民社會的興起。1979 年，美麗島雜誌社成立，成爲黨外運動的重要宣傳工具。1979 年 12 月發生美麗島事件，黨外運動一度受挫，但許多與美麗島事件相關的人士，不久後成爲民主運動的要角，更成爲民主進步黨的核心菁英。

自 1986 年以來，蔣經國開始推動一系列政治自由化的改革，以回應來自中產階級之壓力。由於美援的幫助以及出口導向經濟政策的執行，台灣的經濟從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快速成長，不僅傳統中產階級日益茁壯，同時也產生以自由派學者、白領專業人士和高等教育知識份子為主的「新中產階級」；而這批新中產階級份子領導其他階級成員共同推動台灣民主運動，並促成進一步的民主轉型（Hsiao 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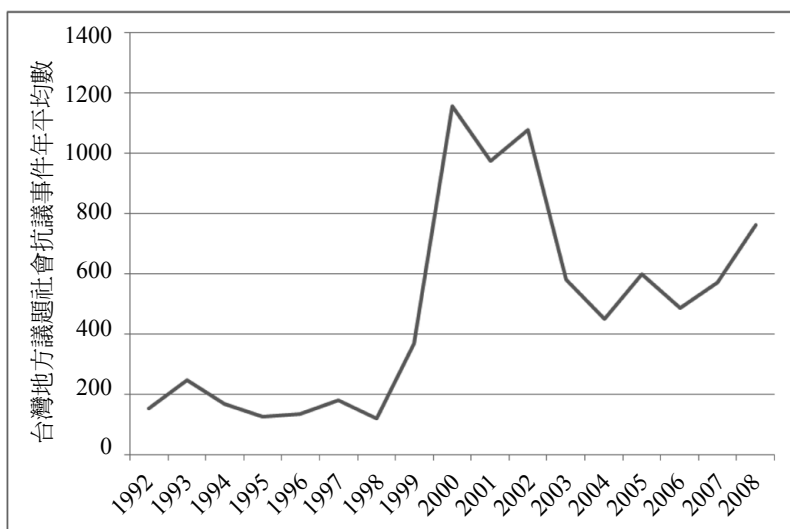
從 1980 年代晚期到 1990 年初期，黨外運動逐漸為新興的公民社會形成一股重要的統合力量。根據黃德福（1988, 7）的研究，在 1983 年到 1987 年的 170 個政治抗議事件中，黨外運動成員參與了其中的 90 件。1987 年 5 月，新潮流系在民進黨內主導成立「社會運動部」，與許多社會運動團體進行結盟，以整合反抗黨國體制的力量。此後，民進黨不僅成為重要的政治組織，更由於新潮流系對於勞工運動和環境運動的滲透（Ho 2005, 406），而使民進黨對於許多社會運動具有直接的影響力。

1990 年代的台灣見證了強大的公民社會力量與民主轉型的過程。李登輝藉由回應「野百合運動」，順勢推動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工程，包括國會全面改選以及推動修憲以進行總統直選。1996 年，李登輝成為中華民國首任直選總統，卻開始陷入黑金政治與犯罪率節節升高的泥淖；1997 年 5 月，因為白曉燕命案而發起的數場街頭運動，各社會團體與意識型態截然不同的各政黨皆參與支持，撼動連戰內閣，也間接使得國民黨在該年年底縣市長選舉苦嚙空前挫敗。

1990 年代因為選舉管道的全面暢通，使先前的黨外力量慢慢被整合進制度化的政治場域中，而民進黨也逐漸修正其草莽的街頭路線，將資源轉移到選舉事務上。西元 2000 年，台灣首度政黨輪替。民進黨在執政後，將許多社運領導者整合進

政府體制，但同時也變得愈來愈保守（吳介民 2002）。台灣的社會運動動員能力在陳水扁兩任的執政下被削弱很多，以地方議題為主的社會抗爭數明顯減少，一直到 2008 年國民黨再度執政後，社會運動的能量似乎才又觸底反彈。

圖一 台灣地方議題社會抗議事件年平均數的變化（1992～2008）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 Wu 和 Chu（2010）。

圖一顯示了台灣地方社會抗議事件數從 1992 年到 2008 年歷年來的變化趨勢，其中在 2000 年政黨輪替之前，台灣每年所發生的社會抗議數約 188 件左右；但在 2000 年和 2001 年，社會抗議數飆新高，總計在 2000 年到 2003 年期間，台灣每年地方抗議事件平均數超過 300 件。然而從 2002 年開始，台灣的社會抗議事件數開始下滑，一直到 2007 年，這個下滑的趨勢才開始反轉，而在馬英九上台後，社會抗議事件數則又呈現攀升的趨勢。

我們要如何解釋台灣社會抗議事件數的變化呢？從圖一

來看，陳水扁的上台似乎導致了社運動員在 2000 年和 2001 年的急速攀升，但在不久後，社會抗議事件數卻又急遽下降。因此，民進黨在中央執政對於社會抗爭動員的影響，有待進一步檢驗。更重要的是，正如和先前所提到的，若只看加總後的整體抗議事件數，並無法得知在地區層次上的社會抗議事件數如何變化。爲了探索影響不同縣市民衆的抗爭動力，本研究採取政治機會結構論的角度，試圖爲台灣地方層級社會抗議事件發生的頻率提出解釋。下一節，我們將討論政治機會結構論，並以實際的案例爲基礎，爲本研究提出可供驗證的假設。

參、政治機會結構與台灣的地方抗爭

McAdam、Tarrow 和 Tilly（1997）曾提出一個研究社會運動的整合性架構，強調政治機會（political opportunities）、動員結構（mobilizing structures）和構框過程（framing processes）對於理解社會運動的重要性。首先，政治機會論討論的是政治體制的開放程度如何對於集體行動者造成動員的機會與限制，進而對於抗爭行動產生促進或阻礙的作用（Kriesi 2004; Meyer 2004）；動員結構論（或資源動員論）探討的是社運如何透過建立組織、集結必要的資源，以發起集體行動（Jenkins 1983; McCarthy and Zald 1977）；構框過程論探討的是集體行動者如何透過文化符碼的框架建構，突破或挑戰不友善與高壓的政治結構，讓人們願意組織並參與社會抗議行動（Gamson and Meyer 1996; Koopmans and Statham 1999）。

我們認爲，上述三個常見的社會運動理論各有千秋，皆爲社會抗議提供了重要的解釋。然而，構框過程論注重對於文化符碼與認同的分析，比較常運用在個案研究或比較案例研究，可爲特定的社會運動提出深入的探討，進而了解特定社運發展的來龍去脈；相對而言，不僅是質化研究學者，量化研究學者

亦較常利用政治機會論以及資源動員論進行社會運動的研究。由於本研究從較宏觀的角度解析地方社會抗議發生的頻率，並試圖提出具通則化的解釋觀點，同時也爲了集中討論的焦點，我們將採取政治機會論的理論視角，爲本研究建構可供驗證的假設。

政治機會論的主要理論概念爲「政治機會結構」（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探討的是以國家爲中心的政治變數組合，如何影響集體行動的成本，進而對於集體行動者在動員時產生助益或限制（何明修 2004, 49）。具體而言，政治機會結構論主張社會運動的出現、策略和結果皆被特定國家政治體制提供的機會與限制所影響（Kriesi 2004; Meyer 2004）。這個理論的基本主張爲：當社運組織者或公民在面對政治體制提供有利的機會時，他們進行社運動員的可能性就會比較高；反之，在面對政治體制造成不利的限制時，則社運動員的可能性將會降低。在穩定的民主國家，社會運動會因爲政治機會結構的開放和封閉而有週期性變化的過程。

若我們整合 McAdam（1996）與 Tarrow（1996）對於政治機會結構的討論，可整理出四個政治機會結構的組成元素：一、制度化政治管道的開放程度；二、菁英體制的穩定程度；三、政治聯盟者的存在與否；四、國家鎮壓能力與傾向。首先，民主化和政治管道的開放與否密切相關。當民主持續深化，由於民主政治體制可幫助社會團體提供更多制度化的政治參與、以及解決爭端的管道，因而降低人民上街頭抗議的動機（Pickvance 1999）。然而，其他研究指出，由於民主化降低了政府對於社運的阻撓與壓迫，而民主化也意味政府比較會回應人民的要求，因此，在民主化程度較高的國家，其公民較常會走向街頭以爭取自身的權益（Goldstone 2004; Markoff 1996）。

其次，菁英體制的穩定程度也會影響社會抗議的發生。Eisinger（1973）認為抗議事件最容易在一種半開放、半封閉的政治結構下發生。換言之，在極封閉的政體內，政府的強力鎮壓會嚇阻抗議動員；相對而言，在極開放的政體內，政治表達的管道暢通且有效，使得抗議行動變得沒有必要。¹ Van Dyke（2003, 232）認為，分裂的政治菁英集團（divided elites），可說是一種半開放、半封閉的政治機會結構。在這樣的條件下，抗議團體有較高的成功機會與特定的菁英合作，進而促發更多的抗爭動員（Inclán 2012）。

除了民主化以及分裂的菁英集團之外，在政府體制中是否有同情社運的菁英盟友，更是一種非常關鍵的政治機會結構因素（Bruhn 2008, 56-57; Meyer and Minkoff 2004）。雖然從表面上來看，若同情抗爭運動的政治菁英上台，抗爭團體似乎可以直接尋求菁英的協助，因而降低抗爭行動的必要性。然而，採取抗議行動並不必然與尋求菁英協助相抵觸。當社會團體認為發動抗爭有助於達成目標時，則執政的菁英盟友反而是抗爭團體「更好下手的目標」（soft target），原因是菁英盟友比較會回應運動的訴求，同時也較不會以鎮壓的手段對付抗議團體，因而降低了動員的成本，使抗爭動員更容易發生（Bruhn 2008, 15）。許多實證研究顯示政治菁英盟友對於抗爭行動確實具有鼓勵作用。例如，Meyer 和 Minkoff（2004）關於美國民權運動的研究發現：當民主黨執政時，政治環境對於社運動員提供較有利的機會，因而鼓動了更多的抗議運動。Bruhn（2008, 56-57）的研究則發現，在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亞，當左派政

¹ Eisinger（1973）指出美國地方層級政府制度的差異，會造成民眾制度性參與的落差。然而，在台灣每個縣市的制度大體上是一致的，例如都可以直接選擇縣市長，至於不同時間的參與機會差異，我們在模型裡已經控制民主化程度，所以開放與參與的非線性關係應不存在台灣。

黨執政時，地方社運團體會發動更多的抗議行動。²

在社會運動的文獻裡，政治機會結構論雖然是個很常見的解釋觀點，但並非無懈可擊。例如，有學者批評政治機會結構論可能會有「結構決定論」（structural determinism）的問題，指出集體行動者若缺乏認知與詮釋政治機會結構的能力，便無法利用有利的政治機會結構來進行動員（Goodwin and Jasper 1999）；另外，「有利的政治機會」這個概念有時並非顯而易見，例如 Herrera 和 Markoff（2011）發現在西班牙鄉村地區，由於民主化不夠徹底，反而使社會運動的動員更加不利；第三，用政治機會結構論來研究大樣本的社會抗議事件，常常會對於不同抗爭行動各自的目標、意識型態與論述省略不談，而使得這些抗爭行動看起來像是「沒有實質內容」的抗爭事件（Koopmans and Statham 1999, 227）。然而，儘管有這些潛在的問題，誠如何明修所指出的，若能明確辨認抗爭運動與政府間的互動過程，「政治機會結構」仍然是個具高度解釋力的理論性概念（Ho 2005, 405）。

在 1980 年代的台灣，由於國民黨黨國體制是黨外運動與社會運動的共同敵人，所以政治反對力量與社會運動往往相互重疊，兩者存在一種聯盟關係。然而，到了 1990 年代，民進黨開始試圖爭取更多選民的支持以獲取政治權力，因而開始淡化其街頭抗議的路線，在 1990 年代以後與社運團體的關係似乎已不若以往密切（吳介民 2002）。到了 2000 年，台灣歷經首次政黨輪替，根據何明修（Ho 2005）的看法，「民進黨在中央執政」作為一種政治機會結構，有四種特徵：一、民進黨

² 相對而言，Jung（2010）的研究卻發現，當左翼政黨勝選並掌控政府時，社會抗議事件數會下降，而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左翼政府較能為社會運動提供解決問題的管道，因為降低發動抗爭的必要性。

政府為社運開啓了更多的政策參與管道；二、民進黨的意識型態從支持改革轉變為保守；三、朝野的高度政治對立為保守勢力反對改革提供了更好的機會；四、在民進黨保守化的脈絡下，為在野的泛藍陣營與社運的合作提供空間，但其實是以一種機會主義的態度支持社運抗爭。面對這樣的政治機會結構，民進黨與社會運動的關係產生了質變，呈現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

何明修（Ho 2005）對於「民進黨執政作為一種政治機會結構」的描述，非常精確，也增進了我們對於政黨輪替後社運發展的理解。然而，他的描述忽略了兩個重要的面向。首先，何明修並未特別著墨政黨輪替後，新政府對抗爭處理（policing of protest）立場的轉變，而是直接認為「常態化與地方化的抗爭處理已在 1990 年代中期建立，並延續到政黨輪替之後」（Ho 2011, 302）；其次，何明修並未明確考量政治機會結構的不同分析層次，可能會對於抗爭造成特定的影響。

為了補充上述兩點，我們主張，在研究政治機會結構對於地方抗爭的影響時，需同時考量中央層次與地方層次的政治機會結構。其次，我們主張，當民進黨在執政時，對於抗爭者而言，可說是一種更為開放的政治機會結構，而這種政治機會結構的主要特徵在於：由於民進黨過去與社運關係密切，且有豐富的街頭抗爭經驗，使民進黨籍政治菁英在執政後，面對民衆抗議事件時，比較能採取同情、理解的態度，使人民有更高的意願以直接抗爭的行動表達其訴求；同時，相較於國民黨籍首長或無黨籍首長，民進黨籍首長的警力在面對抗爭時，較不會採取強力鎮壓的手段，可間接降低抗爭動員的成本。

從實證的角度來看，相較於國民黨對待社運的態度，民進黨在中央執政時，雖然有保守化的傾向，但對於一般的民衆抗爭行為，仍普遍持較友善、容忍的態度，而這可從上圖一得

出初步觀察，亦即在民進黨執政時期，社會抗爭事件的數目普遍比國民黨執政時多。何明修的研究曾引用一位社會運動人士的說法，指出民進黨政治人物與環運人士參與抗爭時，等於是免於被警察毆打的「保證」（Ho 2011, 296）。換言之，過去國民黨執政時採取強硬的抗爭處理立場，不僅讓社運與民進黨的聯盟關係更加緊密，而這樣的經驗，也讓民進黨在中央執政後，以較為寬鬆的手段處理抗爭行動。何明修在其對台灣抗爭與民主化的研究成果（Ho 2011），以歷史的角度說明民進黨政府對於社會抗爭行動，確實採取較為寬容的立場。

除了民進黨在中央的執政外，民進黨在地方縣市的執政，對於社會運動者而言也是一種有利的政治機會結構。根據許仁碩（2015）的研究，地方首長的政黨輪替，使在民進黨執政縣市進行抗爭的社會運動工作者，明顯感受到抗爭管制的放寬，例如陳水扁擔任台北市長時，社運團體不需提出申請也可以去市政府抗議，而警方舉牌的時機也變得較有彈性（許仁碩 2015, 78）；同時，原本為中央一條鞭的警政體系，在法制上歷經地方自治權力的增強，而縣市警力在 2000 年中央政黨輪替後，保安警力的調度與指揮開始轉為地方責任制，強化了地方政府在抗爭處理上的發言權（許仁碩 2015, 139）。因此，當民進黨籍縣市首長上台後，反映在警察處理抗爭時，「在其權限下也可能會給予抗爭者更大的空間，而採取較溫和的方式處理」（許仁碩 2015, 79）。換言之，民進黨執政縣市較少對於抗議進行鎮壓，不是不能鎮壓，而是地方政府確實對於警力的指揮握有較大的主導權，不願意進行鎮壓。

2014 年 3 月 18 日爆發反對「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太陽花運動」，民進黨籍立法委員除了以實際的動員全力支持該運動之外，民進黨籍縣市長對於中央政府調派地方警力支援驅離抗議民衆，多抱持反對態度。例如雲林縣長蘇治芬

與嘉義縣長張花冠，皆要求所屬縣市警局立即召回支援警力，而已返回的台南市警員，則在市長賴清德的要求下不得再北上支援；相對而言，台中市長胡志強則支持警政署統一調配北上支援的地方警力（自由時報 2014）。台北市長郝龍斌在太陽花運動爆發前幾天，對於運動參與者的訴求尚保持尊重，但在 3 月 23 日之後，對抗爭行動的寬容態度立即急轉直下（Ho 2015, 85）。

上述討論顯示，當民進黨在地方縣市執政時，其首長對於全國性議題的抗爭普遍採取較為友善、包容的態度，為抗爭者的行動提供較有利的機會。然而，民進黨籍縣市首長對於地方議題為主的在地抗爭，同樣也採取較容忍、開放的態度，而這反映在民進黨籍縣市首長對於抗爭者的回應較為積極（Ho 2005, 407-408）。例如在 2000 年 6 月 17 日，高雄市柴山自然公園促進會等五十一個團體發起抗議行動，指控市府對位於柴山的私人營利違建，在管理及取締上態度消極，時任高雄市長的謝長廷立即指示統籌權責單位建立單一窗口受理檢舉，並先拆除重大違建（聯合報 2000）。2002 年 9 月 25 日，宜蘭縣蘇澳鎮龍德、頂寮里里民 200 多人抗議籌設中的五結鄉垃圾場，將與鄰近的蘇澳鎮垃圾場、縣焚化爐、龍德、利澤工業區共同造成更大的空氣汙染，後來在時任縣長劉守成的協調下，順利解決問題（聯合報 2002）。2006 年 4 月 12 日，雲林縣二崙鄉數百位港後村村民協同台聯黨雲林縣黨部主委廖文生，抗議當地興建大型養豬場時並未辦理環境影響評估，蘇治芬主政的縣府農業局與業者協調後，業者同意暫時停工（聯合報 2006）。

然而，即使上述幾個實例說明了在面對民進黨執政的政治機會結構，由於抗爭成功的可能性較高，使人民較常發動抗議行動，但這是否為一個系統性的通則，或只是巧合，有待利用

更多的資料進行實際驗證。基於上述討論，本文從中央與地方兩個不同的分析層次，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1：當民進黨在中央執政時，全台各縣市將有較多的地方抗議事件。

假設 2：在民進黨執政的縣市，該縣市將發生較多的地方抗議事件。

除了政治菁英盟友外，選舉年也可被視為有利於社會抗爭動員的政治機會結構（Meyer and Minkoff 2004, 1477-1478）。一般而言，選舉年對於抗爭動員具有三種促進效果：一、在選舉年時，各政黨陣營相互較勁、甚至攻擊，國家政治體制的運作在這個時期變得較不穩定，政治不確定性高，因而使人民較常利用抗爭手段來表達訴求（Snyder and Tilly 1972）；二、在競選造勢期間，政治行動容易獲得媒體關注，使社運團體得以利用這樣的時機儘可能的發聲，要求各候選人作回應（Meyer and Minkoff 2004）；三、社運團體在選舉年發動抗議，可用實際行動向特定政黨證明其作為選舉盟友的重要性，因而可以在選後提高自身的政治籌碼（Bruhn 2008, 46）。在目前的實證研究中，Álvarez Rivadulla（2011）發現在總統選舉年時，烏拉圭都會區的貧民確實會發動更多的「佔地運動」（squatting movement）；Inclán（2012）關於墨西哥原住民抗爭的研究亦發現在選舉年時，較常發生支持原住民運動的抗爭行動。吳根明與陳奎旭（2009）關於林園反三輕運動的研究，發現選舉年的接近，較容易讓行動者把環境運動的議題擴大到整個林園鄉，並博得媒體版面，對於地方抗爭的凝聚與動員，具有非常關鍵的影響。因此，在台灣，選舉週期似乎會對抗爭運動產生促發作用。然而，實際上是否真是如此，有待實證資

料的檢驗。綜上所述，本文針對總統選舉年和地方首長選舉年，分別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3：在總統選舉年時，全台各縣市將會發生較多的地方抗議事件。

假設 4：在地方首長選舉年時，全台各縣市將會發生較多的地方抗議事件。

肆、研究設計、資料來源以及變數

爲了要檢驗政治機會論的假設，我們利用台灣地方層級抗議事件的數據資料進行「橫斷面－時間序列」（cross-sectional time-series）的統計分析。在我們的模型中，分析單位是「縣（市）一年」，資料包含 25 個縣市（包括台北市、高雄市、金門縣與連江縣），跨越年份爲 1992 年至 2008 年（計 17 年），總樣本數爲 425。

我們取 1992 年作爲分析的始點，主要是因爲台灣在 1992 年才進行國會的全面改選，民主化大門開啓；同時，在實證模型中的許多控制變數，從 1992 年才開始有資料。另外，以 2008 年作爲分析的終點是因爲我們所使用的社會抗爭資料只紀錄到 2008 年爲止，此爲本研究的一大限制。因此，我們在此強調，本研究爲台灣從民主化之後至 2008 年之間的實證發現，對於 2008 年以後的政治變化與社會抗議，或許無法進行過於通則性的推論。

一、依變數

在我們的實證統計模型中，依變數是「每年以當地議題爲訴求、並以政府單位爲訴求對象的地方抗爭次數」，其操

作化的定義為：一個縣市的當地居民，每年以當地議題為主要訴求、並以中央或地方政府機關或人士作為訴求對象，在該縣市內或在中央政府機關大樓之周邊或內部所發動的抗議事件數。³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論文中，我們主要關切的是「抗爭事件」數，而不是「社會運動」數。換言之，我們認為抗爭事件不完全等同於社會運動，許多小型的抗爭常常是短暫的單一事件，與社運並不見得有關。

我們在操作化依變數時有兩個重要的考量。首先，我們認知到抗議事件有其頻率、手段、目標、行動範圍、訴求、參與人數、與持續時間長短等差異，但基於研究設計、資料限制以及分析方法的考量，我們將只集中在地方抗議事件頻率的分析。其次，我們認知到地方抗議行動的訴求目標不見得是政府，有可能是其他行為者，例如私人公司等。然而，本研究將聚焦以政府單位或人士為訴求目標的抗議行動，主要是因為這類的集體行動對於改變政府決策的影響力較大，而這類的抗爭也與政黨和選舉等政治因素較有關係。

為了建構本研究實證分析所需的依變數，我們採用 Wu 和 Chu（2010）的台灣抗議事件資料庫。這個資料庫以 1987 年到 2008 年的《聯合報》作為編碼的主要資訊來源，總共建立 11,555 筆在全台各地所發生的社會抗爭事件與行動。在此資料庫中，這些抗爭行動總共包含了三大類、計 29 種的行動方式，包括暴力手段（例如損害財物）、非暴力的破壞公共秩序行動（例如罷工），以及未妨害公共秩序的集體行動（例如公開書面陳情）。除了手段的形式之外，每個事件亦包括其他重

³ 在本研究的資料中，有不少抗爭事件是當地人民為了提高議題的能見度，特地搭車前往行政院或立法院前進行抗議。雖然抗爭地點不在居民來自的縣市，而是在台北，但由於抗爭的訴求為在地議題，因此，我們將這樣的抗爭事件歸類成原縣市的地方抗爭，應是合理的作法。

要變數的編碼，包括抗議事件的發生時間、地點、目標與規模等變數。

由於這個資料庫是以每個抗爭事件作為單位，爲了要建立符合本研究設計的資料集，我們得先從 Wu 和 Chu 的資料庫中選取所須的抗議事件之後，再依據每個縣市、每年的方式進行重新整理與編碼。基於本研究對於依變數的操作化定義，我們在 Wu 和 Chu 的資料庫裡所選取的抗爭事件須同時符合兩個特質：該事件的抗爭訴求對象為政府單位或人士以及該事件的行動為街頭抗議的形式。就第一個特質而言，該事件的抗爭訴求對象為以下其中之一或更多，包括總統、立法院、監察院（或監察委員）、國民大會、中央政府部門、軍隊、部會首長與（或）部會、地方政府（縣市長、鄉鎮市區長、縣市議會）、警察（包括各級警察機關）、省長（省政府或省議會）、個別立法委員或國大代表、司法院、各級法院、各級檢調單位等總計 14 類國內政府官員與部門。

就第二個特質而言，該事件的行動模式為以下其中之一或更多，包括阻礙相關管理人員執行任務、小規模推擠衝突、罷工或怠工、佔領公共建築、示威遊行集會、封鎖道路或公共場所、佔據企業公司、抬棺抗議或其他具強烈抗議象徵意涵的行動、學生罷課、頭綁白頭巾或拉白布條之行動、揚言罷工與威脅進行抗爭行動、絕食抗議、演出行動劇之抗議行動等 13 種行動模式。

此外，依抗爭訴求與發生地點等抗爭層級來看，表三顯示，以政府為訴求對象的抗爭事件，若依行動訴求的涵蓋範圍，可大致分為三種：一、地方性議題的抗爭；二、跨縣市或全國性議題的抗爭；三、原先是以地方性議題為主，但後來演變成跨縣市或全國性議題的抗爭。在本研究中，我們聚焦上述第一類的抗爭事件。其中，抗爭發生地點在縣市行政區內

表三 台灣各縣市以政府單位為訴求對象的地方抗爭次數統計
(1992~2008)

抗議事件的 發生地點 抗議行動訴求的 涵括範圍	縣市行 政區內	中央政府機關大 樓周邊或內部	跨縣市	總計
地方性議題	1,991	87	0	2,078
跨縣市議題或全國性議題	216	452	36	704
原先是地方性議題，後來演 變成跨縣市或全國性議題	205	37	0	242

資料來源：Wu 和 Chu (2010)。

說明：中央政府機關包括位於台北市的中央政府各級機關，或是位於南投中興新村的台灣省政府機關。

者有 1,991 個事件，而發生在台北市中央政府機關或省政府機關者，有 87 件。因此，在我們的資料集裡，總計有 2,078 個以地方議題為訴求、政府單位為訴求對象的地方社會抗爭事件。⁴

另外有幾種抗爭事件雖然有其研究旨趣，但不在我們的分析範圍之內：一、以全國層次議題為訴求的抗議行動，例如抗議基本工資的抗爭行動；二、大規模的跨縣市抗爭事件，例如 2006 年要求陳水扁總統下台的紅衫軍運動；三、由外國人士

⁴ 此處的 2,078 個抗爭事件由於利用特定的標準篩選而出，與表一、表二與圖一所根據的資料並不相同。表一、表二與圖一的資料同時包含三種不同類型的抗爭事件：一、表三中 2,078 個地方性議題之抗爭事件；二、採取不同抗爭形式的地方抗議行動（例如向法院按鈴申告）；三、以不是政府的組織或團體（例如私人銀行或公司企業）作為訴求對象的地方抗爭事件。這些資料所包含的事件數，總計為 8,169 件。事實上，我們利用全部抗爭事件的資料為基礎進行實證分析，發現重要自變數的統計結果並未出現很大的改變。

發動的抗議行動，例如東南亞外籍勞工發起的抗議運動；四、以外國政府為訴求對象的抗議行動，例如抗議美國在台協會或是日本交流協會之集體行動；以及五、原先是在地議題為主要抗議，但後來該議題演變成全國關注的議題，例如反核四運動、台北反廢娼抗議、反蘇花高抗議、反對裁撤農漁會信用部抗議、九二一震災戶抗議、聯福製衣等關廠工人抗爭、保留樂生療養院抗爭等。⁵

在本文的實證分析中，我們將具有不同訴求、由不同行為者所發動的抗爭行動，全部納入同一資料集進行量化迴歸分析。這種作法，預設了不同的社會抗爭行為有其同質性，也預設了不同的社會抗爭受到特定變數的影響是一樣的。從質化研究者的角度來看，這些預設或許不見得合理。然而，由於我們的研究目的在於試圖掌握政治機會結構變數影響抗爭頻率的一般性趨勢，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接受上述預設以進行量化迴歸分析，有其必要性。⁶

雖然 Wu 和 Chu 的資料庫擁有龐大且有用的資訊，但在使用這個資料庫時也得特別留心。首先，許多社會運動研究指出，利用報紙作為社運事件編碼的資訊來源依據，可能會有「報大不報小」的偏差，亦即記者通常傾向不去報導較小規模的抗議行動。例如有學者認為一個抗議事件的「新聞價值」取決於該事件的參與人數或是衝突程度（Myers and Caniglia 2004）。因此，我們承認 Wu 和 Chu 的資料庫並無法包含所有發生過的抗議事件，而只是被《聯合報》報導過的抗爭事件。

⁵ 我們在此感謝一位審查人指出某些地方層級抗議事件可能會從地方性議題演變成全國性議題，所以這些抗議事件可能不算是真正的地方社會抗議事件。

⁶ 未來的研究者可依抗爭類型進一步區分，討論不同類型抗爭的發生頻率是否會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

即便如此，我們認為，能見報的抗爭事件通常都有一定的重要性，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Wu 和 Chu 的資料庫仍一定程度地掌握了重要抗爭事件的資訊。

另一個潛在問題則是報章媒體對於抗議事件的報導可能會因地區而異。例如媒體可能會特別關注在首都發生的抗爭事件，而傾向不報導偏鄉地區的抗議。為了減少「地區偏差」對於編碼的影響（Oliver and Myers 1999），Silver（2003, 191）認為有必要用其他媒體來源蒐集抗爭事件的資料，才能夠透過相互對照處理不同媒體所具有的地區偏差。令人遺憾的是，這樣的作法在本研究中不具可行性，因為就我們所知，Wu 和 Chu 的資料庫是目前學界唯一對於台灣社會抗爭事件進行超過 20 年編碼的大型資料庫。同時，Wu 和 Chu 的資料庫能讓我們辨別抗爭者的所屬縣市、抗爭訴求的地理範圍，以及在何處舉行抗議。這些編碼雖然不必然能有效減少地區偏差，但我們認為這至少可為地方抗議運動描繪出較完整的圖像。

第三，Wu 和 Chu 的資料庫係以《聯合報》作為資料編碼的來源，所以這些資料可能會因為其黨派立場，在報導抗議事件時可能有特定的偏差（例如 2000 年之後的社會抗議事件數可能會遠多於 2000 年之前）。然而，若使用黨派立場迥然不同的《自由時報》，也有其困難之處，主要是因為網路版的「自由資料庫」僅能從 2005 年 1 月 1 日開始查詢，雖然「台灣新聞智慧網」資料庫有收錄自由時報，但經實際檢索，發現僅從 2003 年 2 月 3 日開始收錄，而且多數新聞僅有標題而未有全文。因此，Wu 和 Chu 的研究團隊只得使用新聞資訊相對完整的《聯合報》作為編碼的資料來源。

根據 Wu 和 Chu，若比較 2005 年以降兩個報紙抗爭事件的涵蓋情形，可發現《聯合報》與《自由時報》對抗爭事件的報導基本上接近，因為地方層級抗爭事件的政治性較低，報

紙因為政治立場選擇性刊載的情形較少，若是演變成全國性議題，因為其重要性，報紙不會省略不報，只會在篇幅上有所差異。但是初步比較，兩個報紙的著重的確是略有不同，自由時報針對環保、醫療與統獨相關的報導次數與幅度會較聯合報來得略頻繁一些，聯合報針對公會與政府協商、陳情、公聽會的報導頻率則較自由時報略為多一些，特別是在勞資糾紛、解聘雇等。報導幅度指的是對於現場描述的詳細度，例如針對某鄉鎮的環保抗爭，警方介入情形、抗爭團體出現抗爭方法，或有政治人物參與等做多篇幅的報導。

由於本文欲解釋的是抗爭事件出現的頻率，而非抗爭的手段或參與團體差異等，所以就這個研究目的而言，只要有抗爭事件的報導即已足夠。此外，根據 Wu 和 Chu，該資料庫在編碼時要求研究助理在以《聯合報》資料庫登錄抗爭事件時，若有報導不夠清楚時，必須另外參酌《自由時報》或《蘋果日報》的報導。因此，整體而言，在編碼的內容上，應不至於有太大的偏誤。

二、自變數

爲了要驗證本文所提出的假設，我們在統計模型中包含四個主要自變數，分別是：民進黨籍總統、民進黨籍縣市長、總統選舉年，以及地方首長選舉年，這四個變數皆爲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其中，當「民進黨籍總統」的變數值爲 1 時，則代表民進黨在中央執政（2000～2007），⁷數值爲 0 則代表國民黨在中央執政；當「民進黨籍縣市長」的變數

⁷ 民進黨在中央執政時期爲 2000 年 5 月到 2008 年 5 月，由於陳水扁在 2000 年 5 月 20 日就任，於該年執政超過 7 個月，所以我們把 2000 年當作是民進黨執政的第一年。事實上，若將此變數編碼爲 2001～2008 年並重新進行統計分析，其結果並未出現很大的變化。

值為 1 時，則代表民進黨在該縣市執政，0 則否；⁸ 當觀察值的年份為 1996、2000、2004 或 2008，其「總統選舉年」變數的值為 1，其餘年份則為 0。地方首長選舉年的操作化較為複雜，其中，當台北市與高雄市觀察值的年份為 1994、1998、2002 或 2006 時，其「地方首長選舉年」的變數值為 1，其餘年份則為 0；當其他縣市觀察值的年份則為 1993、1997、2001 或 2005，則其「地方首長選舉年」的變數值為 1，其餘年份則為 0。綜合而言，如果我們的假設獲得實證支持，則可預期這四個變數的估計係數應帶正值。

三、控制變數

為了考量其他可能會影響地方抗議事件頻率的因素，我們的統計模型中亦包含以下幾個重要的控制變數。首先，先前討論提到民主化程度可能會對於社會抗議的發生造成影響，因此，我們在模型中加入了「台灣民主化程度」作為控制變數，以 Polity IV 分數（Marshall, Gurr, and Jaggers 2014）為測量的指標。Marshall、Gurr 和 Jaggers（2014）的資料庫以「國家一年」為單位，Polity IV 分數最小值為 -10（民主化程度最低），最大值為 10（民主化程度最高）。

其次，既有研究顯示，菁英集團是否分裂，也可能會影響抗爭的發生（Jenkins, Jacobs, and Agnone 2003; Van Dyke 2003）。因此，我們在模型中控制「縣市分立政府」這個變數。此變數為虛擬變數，當其值為 1 時，代表縣市長所屬政黨在縣市議會未能掌握過半席次，0 則代表縣市長所屬政黨在縣

⁸ 民進黨籍的陳重光曾在 2007 年 3 月 1 日到 5 月 22 日代理基隆市長，但由於只有兩個月，所以我們將 2007 年的基隆市編碼為國民黨執政。至於其他像是花蓮縣與澎湖縣等地的補選，我們皆已按照補選的結果進行編碼。

市議會掌握過半席次。

第三，既有研究指出，當經濟表現不佳時，特別是失業率高居不下，往往造成人民對政府的不滿，因而容易導致更多的民衆抗爭（Nam 2007）。此外，都市化程度（一個縣市都會區人口佔該縣市總人口的比例）亦可能影響社會抗議，因為當都市化程度愈高，居民對於住屋、水電與工作的需求將大增，影響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較可能會出現汙染、土地短缺和衛生設施不足等問題。因此，我們可以預期，當都市化程度愈高時，可能會導致更多社會抗議（Percival and Homer-Dixon 1998）。綜合上述討論，我們在模型中加入「縣市失業率」以及「縣市都市化程度」作為控制變數。⁹

第四，若干研究發現當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愈高，則在必要時，人民普遍較有充足的資源可以進行抗議動員，因此可預期該地區將有較多的抗爭行動（Arce 2010, 676）。為了控制經濟發展的效應，我們在模型中加入「縣市人均可支配所得」這個變數。最後，我們在模型中包含「縣市人口數」為控制變數，考量在人口愈多的地方，可能會出現較多的社會矛盾，使執政者較難控制抗議的發生，因而發生愈多的民衆抗爭（Powell 1982, 31-34）。由於「縣市人均可支配所得」與「縣市人口數」這兩個變數的數值過大，使變數的分佈過度右偏，為了減少這種情形對於分析所造成的影響，我們將此二變數各取自然對數予以轉換（natural log transformation）。¹⁰ 下表四呈現本研究依變數和控制變數的描述統計。

⁹ 這兩個變數的資料來源為：一、1992 年到 1997 年的資料來自臺灣省政府主計處（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二、1998 年到 2008 年的資料則來自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a）。

¹⁰ 各縣市人均可支配所得的資料來源為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b），而人口數的資料則來自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a）。

表四 敘述統計表

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樣本數
每年地方社會抗議事件發生次數	4.89	5.98	0	31	425
台灣民主化程度（Polity IV 分數）	8.76	1.11	7	10	425
縣市人均可支配所得（取自然對數）	12.28	0.22	11.62	12.88	425
縣市失業率（取自然對數）	3.19	1.30	0.60	5.50	425
縣市都市化程度	0.73	0.22	0.32	1	425
縣市人口數（取自然對數）	6.27	1.26	1.88	8.25	425

資料來源：Marshall、Gurr 和 Jagers（2014）；Wu 和 Chu（2010）；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14）；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a; 2014b）；臺灣省政府主計處（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四、分析方法

由於本研究的依變數為非負值整數之計次變數（count variable），其數值不是 0 就是大於 0 的正整數，所以並不適合以最小平方法的迴歸模型（OLS regression）作為分析工具。在對非負值整數之計次變數進行迴歸分析時，我們應採行泊松迴歸（poisson regression）或負二項迴歸（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由於在本研究的樣本裡，依變數的變異（variance）比其平均值（mean）來得大很多，呈現過度離散（over-dispersed）的特性，所以我們決定採取負二項迴歸作為分析工具。

其次，在本研究所要分析的資料中，各縣市因為年份不

同而有不同的觀察值，而這些觀察值彼此間並不相互獨立。因此，我們加入 Huber / White / sandwich 穩健變異的估計（robust variance estimator），並以縣市為單位予以集群（clustered by localities），調整係數估計值的標準誤，使之為穩健標準誤（robust standard error）。第三，為了控制各縣市本身獨有的特質對於依變數所可能造成的影響，允許各個分析單位間存在差異性，我們在每個模型中包含各縣市的虛擬變數（雲林縣除外），以估計固定效果模型（fixed-effect model）。最後，由於我們所分析的資料具有時間序列的結構，因此有必要考量依變數「自我相關」（autocorrelation）的可能性。由於目前學界尚未發展出考量自我相關的負二項迴歸模型，為了處理這個問題，我們在模型中加進一個前期依變數進行估計。

伍、台灣地方抗議事件頻率的實證分析

表五顯示四個負二項迴歸模型的統計分析結果。模型 1 只包含政治機會結構的主要自變數；模型 2 為包含主要自變數的固定效果模型；模型 3 為包含主要自變數、控制變數以及前期依變數的隨機效果模型；模型 4 為完整的固定效果模型。

表五 台灣地方抗議事件頻率的統計分析（1992～2008）

變數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民進黨籍總統	1.175*** (0.246)	0.991*** (0.151)	0.764*** (0.129)	0.846*** (0.143)
民進黨籍縣市長	0.407** (0.146)	0.211* (0.107)	0.360*** (0.110)	0.425** (0.146)
總統選舉年	0.388** (0.126)	0.525*** (0.087)	0.545*** (0.106)	0.553*** (0.106)
地方首長選舉年	0.124* (0.061)	0.141* (0.071)	0.171* (0.085)	0.195* (0.095)

變數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台灣民主化程度 (Polity IV score)	—	—	-0.169* (0.074)	-0.202* (0.099)
縣市分立政府	—	—	-0.432** (0.140)	-0.484* (0.206)
縣市失業率	—	—	0.193** (0.066)	0.210** (0.078)
都市化程度	—	—	-1.178** (0.394)	-0.877 (2.508)
縣市民均可支配收入 (取自然對數)	—	—	1.292*** (0.373)	1.534 (0.832)
縣市人口數 (取自然對數)	—	—	0.489*** (0.055)	0.230 (1.297)
地方抗議事件 $t-1$	—	0.054*** (0.009)	0.059*** (0.012)	0.043*** (0.013)
常數	0.559 (0.322)	0.591*** (0.084)	-16.871*** (4.094)	-17.808 (11.826)
縣市虛擬變數 (雲林縣除外)	無	有	無	有
Alpha	1.017	0.295	0.325	0.259
樣本數	425	400	400	400
Log Pseudolikelihood	-1068.950	-880.316	-887.868	-868.041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結果，作者自行整理。

說明：括弧內標示的是依據縣市集群 (cluster) 之穩健標準誤 (robust standard error)；顯著水準：*** $p \leq 0.001$ ；** $p \leq 0.01$ ；* $p \leq 0.05$ 。

首先，在模型 1 中，可發現本研究的政治機會結構論自變數皆帶有正向且達統計上的顯著。在其他變數保持不變的情況下，當民進黨在中央執政時，各縣市普遍會有較多的地方抗議事件；其次，民進黨所執政的縣市，會有較多的地方抗議事件。就選舉年對於抗爭的效應而言，我們發現在總統大選年

時，各縣市會出現較多的抗爭事件；同樣地，在地方首長大選年時，各縣市也會出現愈多的社會抗爭。在模型 2 中，我們在模型中包含了縣市虛擬變數以估計固定效果模型，而這四個自變數的統計顯著程度並沒有出現很大的改變。

我們在模型 3 與模型 4 中加入了控制變數後，主要自變數的統計結果並沒出現很大的變化。換言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民進黨籍總統、民進黨籍縣市長、總統選舉年以及地方首長選舉年等變數的統計係數，皆為正向且具統計顯著性，代表這些變數對於地方抗議事件的頻率均有促進的效果。因此，從表五的統計結果來看，可得知我們主要的理論假設皆獲得了初步的支持。同時，從係數的大小可看出，中央層級政治機會結構變數的係數皆大於地方層級變數的係數。

至於控制變數對於依變數的影響，我們可在模型 3 與模型 4 發現台灣民主化程度對於地方抗議事件頻率帶有負向且具統計顯著性的效果，表示當其他變數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民主化程度愈高，各個縣市普遍出現較少的地方社會抗議事件。這個結果呼應了部分學界的研究發現，亦即當一國整體的民主化程度愈高，反而可能會降低社會抗議的動員，因為民主體制可為社會團體提供更多制度化的政治參與、以及解決爭端的管道，因而降低人民上街頭抗議的必要性（Pickvance 1999）。

其次，縣市分立政府這個變數對於抗爭事件的發生頻率有負向且具統計上顯著的效果。這個發現雖然迥異於既有文獻的實證結果（Jenkins, Jacobs, and Agnone 2003; Van Dyke 2003），但在台灣脈絡下，應該是合理的，因為出現分立政府的縣市，大多是民進黨籍首長加上藍營掌握議會，所以分立政府存在時反而比較會出現地方抗議減少的情形。第三，失業率對於依變數具有正向且具統計上顯著的效果，代表在其他變數保持不變的情況下，若一個縣市有愈多人失業，則該縣市將出

現較多的抗議事件。第四，前期依變數「社會抗議事件 $t-1$ 」的統計係數帶正向且達到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性，代表一個縣市前一年若有愈多地方抗議事件，下一年也會發生愈多的抗議事件。

另外，表五的統計結果顯示，都市化程度、縣市人均可支配所得、以及縣市人口數這三個控制變數，在模型 3 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具體而言，在其他變數保持不變的情況下，都市化程度愈高，地方抗爭事件數將愈低；其次，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縣市，以及人口數較多的縣市，較容易發生地方抗爭事件。然而，在考量各縣市獨有特質的固定效果模型裡（模型 4），這三個控制變數失去了統計顯著性。這樣的結果，代表這些變數的效果會依模型的不同而有所變化。

爲了更謹慎地檢驗統計結果是否足以支持政治機會結構論的假設，我們額外進行了三個穩健性檢測（robustness check）。首先，表五的四個模型皆爲負二項迴歸，但爲了檢測我們的實證發現是否在不同的統計模型會有不同的結果，我們利用泊松迴歸模型對於資料進行重新估計。結果顯示，關於政治機會論假設的相關統計結果並沒有出現很大的改變。其次，由於我們的資料結構包含了中央與地方兩個層級，所以我們也試圖運用 Stata 統計軟體估計跨層模型（multi-level models），¹¹ 結果顯示，我們主要自變數的統計結果仍未出現很大的改變。第三，我們把目前的依變數從計次變數（count variable）轉換成有序多分變數（ordered polytomous variable），以不同的截斷點（cut-off point）建構此變數，並

¹¹ 其模型的指令爲 xtmixed。雖然本研究的資料有同時包含中央與地方層次的跨層結構，但這個模型僅適合估計性質爲連續變數（continuous variable）的依變數，並不適合本研究的依變數（計次變數）。因此，我們只把跨層模型的分析當作是次要的穩健性檢測。

採取順序勝算對數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進行估計。結果顯示，相關的統計結果亦未出現很大的變化。在不同的估計模型，我們發現政治機會結構的相關自變數對於地方社會抗爭事件發生的頻率，皆帶有正向且顯著的效果。簡言之，政治機會論的假設得到實證的支持，而且其結果相當穩健。¹²

在進行了主要的實證分析以及穩健性檢測後，我們可以進一步探究政治機會論的各變數對於抗爭事件頻率的實質影響。由於負二項迴歸模型具有對數性（log-linear）的本質，使得我們只能判讀自變數與控制變數的係數是否達到統計上的顯著，而無法從這些統計結果得知各變數對於依變數實質上會造成多大的影響。爲了進一步評估各個政治機會變數對於社會抗議事件發生頻率所造成實質影響的大小，我們以模型 3 的分析結果作爲基礎，¹³利用 Clarify 統計模擬程式（King et al. 2000; Tomz et al. 2003）搭配 Stata 統計軟體，預測在不同模擬條件下的地方抗議事件數目。

表六 在不同模擬條件下的台灣地方抗議事件估計數

模擬條件（其他變數保持在平均值）	縣市地方抗議事件之預測數目
民進黨在中央執政時	4.43
國民黨在中央執政時	2.07
民進黨執政的縣市	3.81
非民進黨執政的縣市	2.65
總統選舉年	4.56
非總統選舉年	2.64

¹² 爲了節省行文空間並集中討論的焦點，我們並未在文中呈現這些穩健性檢測的結果，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聯繫我們以取得相關的統計結果。

¹³ 由於 Clarify 在加入縣市虛擬變數後進行模擬時無法達到正定（positive definite），所以我們以模型 3 的統計結果作爲基礎進行模擬分析。

模擬條件（其他變數保持在平均值）	縣市地方抗議事件之預測數目
地方首長選舉年	3.44
非地方首長選舉年	2.89
全國民主化程度較低時	3.73
全國民主化程度較高時	2.56
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縣市	3.91
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的縣市	2.21
失業率較高的縣市	3.82
失業率較低的縣市	2.32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結果，作者自行整理。

在令其他變數均保持在其平均值的情況下，我們設定不同模擬條件，利用 Clarify 程式估計出地方社會抗爭事件的平均數。表六的模擬結果顯示，當民進黨在中央執政時，每個縣市的年均地方抗議事件數大約是國民黨在中央執政時的 2.1 倍；在民進黨執政的縣市，其年均地方抗議事件數大約是非民進黨執政縣市的 1.4 倍。另外，在總統選舉年時，每個縣市的地方抗議事件數大約是非總統選舉年的 1.7 倍；在地方首長選舉年時，平均而言，每個縣市的地方抗議事件亦比非地方首長選舉年時多。

關於全國民主化程度與失業率這兩個模擬條件，我們利用平均值正負一個標準差來表示其程度的高或低。表六顯示，當全國的民主化程度較低時，地方抗議事件數比民主化程度較高時來得多；最後，失業率較高的縣市明顯比失業率較低的縣市較常發生民衆抗爭事件，前者的年均抗議事件數約為後者的 1.6 倍。

表七 在不同政治機會結構組合下的台灣地方抗議事件估計數

模擬條件（其他變數保持在平均值）	民進黨執政的縣市	非民進黨執政的縣市
民進黨在中央執政時	5.58	3.89
國民黨在中央執政時	2.61	1.82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結果，作者自行整理。

基於資料本身的限制，本文的討論時間軸為 1992 年至 2008 年，而這段期間是台灣社會抗議行動極為活絡的階段。因此，為了考量更廣泛的台灣政治發展軌跡，我們在此進一步思考不同層級的政治機會結構之組合搭配，是否會對於地方社會抗議事件的發生頻率造成不同的影響。¹⁴ 因此，我們在表七以「民進黨在中央是否執政」以及「民進黨在地方是否執政」兩個不同的面向，結合成一個 2 X 2 表格，再以 Clarify 模擬程式估計台灣地方抗議在不同政治機會結構組合下的數目。表七顯示，在民進黨於中央執政時的各縣市裡，其中由民進黨所執政的縣市會有最多的地方抗議事件（5.58 件）。相較之下，在國民黨於中央執政時的各縣市裡，其中由國民黨（或無黨籍人士）所執政的縣市則會有最少的地方抗議事件（1.82 件）。至於民進黨在中央執政時的非民進黨執政縣市，其地方抗議事件數（3.89 件），則比國民黨在中央執政時的民進黨執政縣市（2.61 件）要來得多。

綜言之，表七的實證分析結果，以更細膩的證據闡明政治機會結構論的因果邏輯。我們發現，當民進黨在中央與地方皆執政時，地方抗議事件發生的頻率最高；而當國民黨在中央與地方皆執政時，地方抗議事件發生的頻率則最低。

¹⁴ 在此我們感謝一位審查人對這個分析的建議。

表八 民進黨執政縣市與非民進黨執政縣市的地方抗議事件估計數比較

模擬條件（其他變數保持在平均值）	民進黨執政的縣市	非民進黨執政的縣市
總統選舉年	5.75	4.01
非總統選舉年	3.33	2.31
地方選舉年	4.33	3.01
非地方選舉年	3.65	2.54
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的縣市	4.96	3.44
經濟發展程度較低的縣市	2.78	1.94
失業率較高的縣市	4.81	3.35
失業率較低的縣市	2.93	2.03

資料來源：本研究分析結果，作者自行整理。

最後，由於我們的一個重要發現是民進黨執政縣市對於抗爭者而言是個較友善的政治機會結構，所以，我們還可以探索選舉週期、經濟發展程度與失業率等因素，在友善／不友善的地方層級政治機會結構，對於抗議頻率所可能造成的影響。表八顯示，在民進黨所執政的縣市，其地方抗議事件發生的頻率，不論在什麼條件下，都比在非民進黨所執政的縣市來得高。在總統選舉年時，民進黨執政縣市的抗議事件數比非民進黨執政的縣市高出近 1.5 倍；而在高經濟發展程度的縣市，民進黨執政縣市的抗議事件數亦比非民進黨執政的縣市多；在失業率較高的縣市，在民進黨所執政的縣市也會發生較多的抗議事件。綜言之，上述分析結果代表民進黨的執政，確實為地方抗議行動提供了更為友善與開放的政治機會結構。

陸、結論

先前的台灣社會運動研究成果，大多以案例研究與質化分析作為研究途徑。本研究和這些文獻不同之處在於，我們利用地方層次的抗爭事件資料，從政治機會結構論的角度出發，解析台灣地方層級社會抗議事件的發生頻率。透過對於自 1992 年到 2008 年之 25 個縣市數據資料所進行的系統性分析，我們發現政治機會論的假設得到有力的實證支持，而這些實證結果也通過了穩健性檢測。

具體而言，本研究的實證分析結果顯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當民進黨在中央執政時，全台各縣市普遍會發生較多的地方社會抗議事件；其次，相較於非民進黨執政的縣市，民進黨所執政的縣市較常發生地方抗議事件。這些實證發現的意義在於：相較於國民黨或無黨籍的首長，民進黨籍首長對於抗爭比較能採取同情理解的態度，使人民有較高的意願以抗爭手段表達訴求；同時，民進黨在執政時，警力在面對社會抗爭較不會進行強力鎮壓，間接降低了抗爭者動員的成本，進而對抗議動員產生促發的效果。這些實證分析結果，對於「政府體制中是否有同情社運的菁英盟友」的政治機會論觀點，提出了更細膩的證據與討論，也回答了「國內各縣市地方抗議頻率差距的原因何在」這個問題。另外，我們從不同的分析層次來驗證政治機會論的邏輯是否能運用在對於地方抗議事件的解釋，也可說是本研究對於當前台灣社會運動文獻所具有的獨特貢獻。

本文運用政治機會結構的理論觀點來系統性地檢驗台灣地方社會抗議的發生頻率，就我們所知，目前應該是台灣學界第一次作這樣的嘗試。我們認知到過去確實有許多文獻對於政治機會結構論有突破性的研究，但從實證的角度來看，我們在本文中將「民進黨的執政」假設為較開放的政治機會結構，其

實並不見得是顯而易見的假設。在進一步同時考量中央層級與地方層級的政治機會結構，比較「民進黨是否在中央執政」以及「民進黨是否在地方執政」兩個面向的不同組合對於地方抗爭的影響，我們發現民進黨在中央執政時期裡由民進黨所執政的縣市，會發生最多的抗議事件，而國民黨在中央執政時期裡由國民黨（或無黨籍）人士所執政的縣市，則發生最少的抗議事件。因此，本文的實證分析豐富了政治機會結構論的理論內涵。

另外，我們的實證分析結果顯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全台各縣市在總統選舉年以及縣市首長選舉年時，會發生較多的地方抗議事件。這個結果印證了選舉週期確實會對地方的社會抗議動員造成影響，亦即在選舉年時，政治不確定性高，使人民較常訴諸抗爭來表達訴求；而相較於非選舉年，社會運動團體較可能會利用選舉年作為一種有利的發聲時機，發動更多的抗議行動以吸引政客與媒體的注意，同時也可藉由動員的實力向特定政黨展現其作為盟友的重要性，在選後有更多的政治籌碼可進行合作。

本研究對於台灣社會抗爭進行系統性的量化分析，不僅讓我們理解不同政治機會結構對於地方抗議運動的效果，為當前台灣社運的學術研究提出了頗具說服力的觀點，更重要的，也為往後的研究提供若干參考的方向。例如，未來的研究者可以從本研究的資料與實證結果作為出發點，觀察公民社會的抗爭參與對於政策產出的影響。在影響因素方面，可以觀察抗爭策略與組織、政治機會結構以及民意態度等因素的影響；在影響是否成功方面，則可以分析抗爭議題轉化為政策提案後，在政策制訂過程中的進展。法案的進展可區分為幾個階段：一、被抗爭者與抗爭者接觸互動，聆聽其訴求；二、被抗爭者將抗爭者的訴求轉化成政策提案；三、被抗爭者將相關訴求轉化成實

際提案並獲得通過；四、被抗爭者確實執行通過的法案；五、觀察法案執行一段時間之後，抗爭者的待遇是否有效獲得改善。相關的分析頗為複雜，超出本研究的範圍，是未來我們可以努力的方向。

其次，本文基於研究設計的考量，只集中解析抗議事件發生的頻率。然而，「頻率」這個面向所傳遞的資訊畢竟極為有限，例如，本文的研究並未回答特定政治機會結構因素與抗議事件的規模、抗議行動的影響力之間的關聯。¹⁵ 在未來，研究者可以針對民衆抗爭不同的型式、行動範圍、訴求、參與人數規模、與持續時間長短等不同面向，進行更深入的探究，例如對於抗爭的類型作進一步區分，討論不同訴求與不同規模的抗爭事件，其發生頻率與機率是否會受到特定政治因素的影響。同時，本文因為資料受限的緣故，並未納入馬英九政府時期的地方社會抗議事件資料，因而導致推論受限。因此，未來的研究者應持續蒐集並更新社會抗爭的研究資料，才能達到更完整的分析。

第三，本研究爲了集中討論焦點，只採取特定的政治機會論角度進行研究，而往後的研究則可嘗試從不同的理論角度探討台灣的地方社會抗爭。例如，研究者可以進一步探討網際網路對於抗爭動員的影響（林澤民、蘇彥斌 2015）；考量其他的社會運動視角，例如探討抗議團體長期的在地影響（何明修 2003；夏曉鵬 2000）；或運作多重研究方法（例如田野調查的參與觀察法），對於地方層級的抗議事件進行更深入的探析，並進一步釐清理論的因果機制。最後，未來的研究者可利用本研究建立的資料集與其他國家的地方抗議資料進行比較分析，將能增進學界對於新興民主國家政治過程的理解。

¹⁵ 我們感謝一位審查人對此所提出的意見。

參考文獻

-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a，〈縣市重要統計指標查詢系統〉，
<http://ebas1.ebas.gov.tw/pxweb/Dialog/statfile9.asp>，查閱時間：2015/08/12。Directorate 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Executive Yuan. 2014a. “Xianshi zhongyao tongji zhibiao chaxun xitong” [Search System of Important Statistics Indicators of Counties and Cities]. (Accessed on August 12, 2015).
-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4b，〈台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可支配所得平均數〉，<http://win.dgbas.gov.tw/fies/doc/mean.xls>，查閱時間：2015/08/12。Directorate General of Budget,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Executive Yuan. 2014b. “Taiwan diqu jiating shouzhi diaocha: kezhipei suode pingjunshu” [Report on the Survey of Family Income and Expenditure: Average Disposable Income]. (Accessed on August 12, 2015).
- 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2014，〈數位落差調查報告〉，
<http://www.ndc.gov.tw/m1.aspx?sNo=0028380>，查閱時間：2015/07/22。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Commission, Executive Yuan. 2014. “Shuwei luocha diaocha baogao” [Survey Report on the Digital Divide]. (Accessed on July 22, 2015).
- 自由時報，2014，〈譴責流血鎮壓綠縣市召回警力〉，<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764947>，查閱時間：2015/07/15。Liberty Times. 2014. “Qianze liuxue zhenya lu xianshi zhaohui jingli” [Condemning the Bloody Repression,

Green Localities Recall the Police Force]. (Accessed on July 15, 2015).

朱偉誠，2009，〈性別主流化之後的臺灣性 / 別與同志運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74：419-424。Chu, Wei-cheng. 2009. "Xingbie zhulihua zhihou de Taiwan xing / bie yu tongzhi yundong" [After Gender Mainstreaming: Where Does That Leave Taiwan's Feminist and Queer Movements?].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Studies* 74: 419-424.

何明修，2003，〈自主與依賴：比較反核四運動與反美濃水庫運動中的政治交換模式〉，《台灣社會學刊》，30：1-49。Ho, Ming-sho. 2003. "Zizhu yu yilai: bijiao fan hesi yundong yu fan meinong shuiku yundong zhong de zhengzhi jiaohuan moshi" [Autonomy and Dependency: Konglia Anti-Nuclear Movement and Meinung Anti-Dam Movement to Construct Two Ideal Types in Political Exchange].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30: 1-49.

何明修，2004，〈政治機會結構與社會運動研究〉，《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報》，7：33-80。Ho, Ming-sho. 2004. "Zhengzhi jihui jiegou yu shehui yundong yanjiu"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and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 *The NCCU Journal of Sociology* 7: 33-80.

何明修，2006，《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台北：群學。Ho, Ming-sho. 2006. *Luse minzhu: Taiwan huanjing yundong de yanjiu* [Green Democracy: A Study on Taiwan's Environmental Movement]. Taipei: Socio Publishing.

何明修，2008，〈體制化及其不滿：二十年來的台灣勞工運

動》，王宏仁、李廣均、龔宜君編，《跨戒：流動與堅持的臺灣社會》：281-298，台北：群學。Ho, Ming-sho. 2008. "Tizhigua ji qi buman: ershi nian lai de taiwan laogong yundong"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 Taiwan's Labor Movement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In *Kua jie: liudong yu jianchi de Taiwan shehui* [Step in Forbidden Zones: Twenty Years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aiwan (1987- 2008)], eds. Hong-zen Wang, Kuang-chun Li, and I-chun Kung. Taipei: Socio Publishing.

何明修，2010，〈誰的家園、哪一種願景？發展主義陰影下的社區運動〉，《台灣民主季刊》，7（1）：1-30。
Ho, Ming-sho. 2010. "Shui de jiayuan, na yizhong yuanjing? fazhan zhuyi yinying xia de shequ yundong" [Whose Community? Which Future Vision? Taiwan's Community Movement under the Shadow of Developmentalism].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7 (1): 1-30.

吳介民，2002，〈解除克勞塞維茲的魔咒：分析當前社會改革運動的困境〉，《台灣社會學》，4：159-198。
Wu, Jieh-min. 2002. "Jiechu kelaosaiweizi de mozhou: fenxi dangqian shehui gaige yundong de kunjing" [Clausewitzian Enchantment: Analyzing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Taiwan's Social Reform Movement]. *Taiwanese Sociology* 4: 159-198.

吳根明、陳奎旭，2009，〈公民社會下的環境運動：林園反三輕運動初探〉，吳根明編，《2009 年南台灣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11-337，屏東：國立屏東教育大學。Wu, Ken-ming, and Kwei-hsu Chen. 2009. "Gongmin

shehui xia de huanjing yundong: yi linyuan fan sanqing yundong chu t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under Civil Society: A Case Study of Anti-China Petroleum Corporation (CPC) Third Naphtha Cracker Movement]. In “2009 Nan Taiwan shehui fazhan xueshu yantaohui lunwen ji” [A Collection of Papers Presented in the 2009 Southern Taiwan Social Development Conference], ed. Ken-ming Wu. Pingtung: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林秀幸，1997，〈重建鄉村社群—新港文教基金會的成立背景與組織探討〉，《思與言》，35（3）：87-117。

Lin, Hsiu-hsin. 1997. “Zhongjian xiangcun shequn: xingang wenjiao jijinhui de chengli beijing yu zuzhi tantao” [The Reconstruction of a Village Community: A Research on the Circumstance and organization of the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oundation of Xingang]. *Thought and Words: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35 (3): 87-117.

林澤民、蘇彥斌，2015，〈台灣快閃政治—新媒體、政黨與社會運動〉，《臺灣民主季刊》，12（2）：123-159。Lin, Tse-min, and Yen-pin Su. 2015. “Taiwan kuaishan zhengzhi: xin meiti, zhengdang yu shehui yundong” [Flash-Mob Politics in Taiwan: New Media, Political Par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12 (2): 123-159.

范雲，2010，〈靜默中耕耘細節的婦運革命〉，吳介民、范雲、顧爾德編，《秩序繽紛的年代 1990-2010》：117-136，台北：左岸。Fan, Yun. 2010. “Jingmo zhong gengyun xijie de fuyun geming” [The Revolution of the Women’s

Movement that Works Hard in Silence]. In *Zhixu binfen de niandai 1990-2010* [*A Decade of Chaotic Order: 1990-2010*], eds. Jieh-min Wu, Yun Fan, and Er-de Gu. Taipei: Zuoan.

夏曉鵬，2000，〈美濃反水庫的社區抗爭〉，陳光興編，
《發現政治社會：現代性、國家暴力與後殖民民主》：
64-66，台北：巨流。Hsia, Hsiao-chuan. 2000. “Meinong
fan shuiku de shequ kangzheng” [The Anti-Dam Community
Protests in Meinung]. In *Faxian zhengzhi shehui: xiandaixing,
guojia baoli yu hou zhimin minzhu* [*Locating Political Society:
Modernity, State Violence and Postcolonial Democracies*], ed.
Kuan-hsing Chen. Taipei: Juliu.

許仁碩，2015，〈臺灣「警察處理抗爭」之法制的考察及省
思－以政黨輪替時代的警察策略及其反制為核心〉，台
北：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系碩士論文。Hsu, Jen-
shuo. 2015. *Taiwan “jingcha chuli kangzheng” zhi fazhi de
kaocha ji shengsi: yi zhengdang luntai shidai de jingcha celue
jiqi fanzhi wei hexin* [*Rethinking The Legal System of Policing
Protest in Taiwan: Focusing on Protest Policing and Anti-
repression Strategy after Party Alternation*]. Taipei: MA thesis,
College of Law,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黃長玲，2008，〈民主深化與婦運歷程〉，王宏仁、李廣
均、龔宜君編，*《跨戒：流動與堅持的臺灣社會》*：
263-279，台北：群學。Huang, Chang-ling. 2008. “Minzhu
shenhua yu fuyun licheng” [Democratic Deepening and the
Process of Women’s Movement]. In *Kua jie: liudong yu jianchi
de taiwan shehui* [*Step in Forbidden Zones: Twenty Years*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aiwan (1987- 2008)], eds. Hong-zen Wang, Kuang-chun Li, and I-chun Kung. Taipei: Socio Publishing.

黃鈴華，2005，《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國會路線》，台北：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Iwan Nawi. 2005. *Taiwan yuanzhu minzu yundong de guihui luxian* [*Taiwan Indigenous Movement at the National Legislative Yuan*]. Taipei: Institute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

黃德福，1988，〈自力救濟之回應：分析與評估〉，「自力救濟與公權力行使」研討會，台北：財團法人明德基金會。Huang, Te-fu. 1988. “Zili jiuji zhi huiying: fenxi yu pinggu” [The Response to the Self-help Movement: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Self-help Movemen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Authority. Taipei: Mingde Foundation.

臺灣省政府主計處編，1992，《臺灣省各縣市重要統計指標》，南投縣：臺灣省政府主計處。Taiwan Provincial Bureau of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1992. *Taiwan sheng ge xianshi zhongyao tongji zhibiao*. [*Important Statistics Indicators of Localities in Taiwan Province*]. Nantou: Taiwan Provincial Bureau of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臺灣省政府主計處編，1993，《臺灣省各縣市重要統計指標》，南投縣：臺灣省政府主計處。Taiwan Provincial Bureau of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1993. *Taiwan sheng ge xianshi zhongyao tongji zhibiao*. [*Important Statistics Indicators of Localities in Taiwan Province*]. Nantou: Taiwan

Provincial Bureau of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臺灣省政府主計處編，1994，《臺灣省各縣市重要統計指標》，南投縣：臺灣省政府主計處。Taiwan Provincial Bureau of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1994. *Taiwan sheng ge xianshi zhongyao tongji zhibiao*. [Important Statistics Indicators of Localities in Taiwan Province]. Nantou: Taiwan Provincial Bureau of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臺灣省政府主計處編，1995，《臺灣省各縣市重要統計指標》，南投縣：臺灣省政府主計處。Taiwan Provincial Bureau of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1995. *Taiwan sheng ge xianshi zhongyao tongji zhibiao*. [Important Statistics Indicators of Localities in Taiwan Province]. Nantou: Taiwan Provincial Bureau of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臺灣省政府主計處編，1996，《臺灣省各縣市重要統計指標》，南投縣：臺灣省政府主計處。Taiwan Provincial Bureau of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1996. *Taiwan sheng ge xianshi zhongyao tongji zhibiao*. [Important Statistics Indicators of Localities in Taiwan Province]. Nantou: Taiwan Provincial Bureau of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臺灣省政府主計處編，1997，《臺灣省各縣市重要統計指標》，南投縣：臺灣省政府主計處。Taiwan Provincial Bureau of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1997. *Taiwan sheng ge xianshi zhongyao tongji zhibiao*. [Important Statistics Indicators of Localities in Taiwan Province]. Nantou: Taiwan Provincial Bureau of Accounting and Statistics.

蕭遠，2011，〈網際網路如何影響社會運動中的動員結構與組

織型態？——以台北野草莓學運為個案研究》，《台灣民主季刊》，8（3）：45-85。Hsio, Yua. 2011. “Wangji wanglu ruhe yingxiang shehui yundong zhong de dongyuan jigou yu zuzhi xingtai? yi Taipei ye caomei xueyun wei gean yanjiu” [How the Internet Impacts Social Movements: A Case Study of the Taiwan Wild Strawberry Movement].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8 (3): 45-85.

賴鈺麟，2003，〈台灣同志運動的機構化：以同志諮詢熱線為例〉，《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5：79-114。Lai, Yu-lin. 2003. “Taiwan tongzhi yundong de jigou hua: yi tongzhi zixun rexian weili” [Taiwan Tongzhi Hotline Association]. *Journal of Women's and Gender Studies* 15: 79-114.

聯合報，2000，〈搶救柴山團體昨陳情〉，udndata.com，查閱時間：2016/02/13。United Daily News. 2000. “Qiangjiu chaishan tuanti zuo chenqing.” [Groups Petition to Save Chaishan]. (Accessed on February 13, 2016).

聯合報，2002，〈五結籌建新垃圾場蘇澳人抗議〉，udndata.com，查閱時間：2016/02/13。United Daily News. 2002. “Wujie choujian xin lesechang suao ren kangyi.” [Suao People Protest Against New Landfill]. (Accessed on February 13, 2016).

聯合報，2006，〈二崙建養豬場上百人抗爭〉，udndata.com，查閱時間：2016/02/13。United Daily News. 2006. “Erlun jian yangzhu chang shangbai ren kangzheng.” [Hundreds Protest Against Pig Farm Construction]. (Accessed on February

13, 2016).

Álvarez-Rivadulla, María José. 2011. "The Evolution and Dynamics of Land Squatting in Montevideo, Uruguay." Paper presented at International RC21 Conference, Amsterdam, NL.

Arce, Moises. 2010. "Parties and Social Protest in Latin America's Neoliberal Era." *Party Politics* 16 (5): 669-686.

Bruhn, Kathleen. 2008. *Urban Protest in Mexico and Brazil*.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isinger, Peter K. 1973. "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7 (1): 11-28.

Gamson, William A., and David S. Meyer. 1996. "Framing Political Opportunit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eds.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75-290.

Goldstone, Jack A. 2004. "More Social Movements or Fewer? Beyond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to Relational Fields." *Theory and Society* 33 (3-4): 333-365.

Goodwin, Jeff, and James M. Jasper. 1999. "Caught in a Winding, Snarling Vine: The Structural Bias of Political Process Theory." *Sociological Forum* 14 (1): 27-54.

Herrera, Antonio, and John Markoff. 2011. "Rural Movements and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in Spain." *Mobilization* 16 (4): 455-474.

Ho, Ming-sho. 2003. "The Politics of Anti-Nuclear Protest in Taiwan: A Case of Party-Dependent Movement (1980-2000)." *Modern Asian Studies* 37 (3): 683-708.

Ho, Ming-sho. 2005. "Taiwan's State and Social Movements under the DPP Government, 2000-2004."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5 (3): 401-425.

Ho, Ming-sho. 2011.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Democratizing Taiwan (1980-2004): A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Perspective." In *East Asian Social Movements: Power, Protest, and Change in a Dynamic Region*, eds. Jeffrey Broadbent, and Vicky Brockman. New York, NY: Springer.

Ho, Ming-sho. 2014. "The Fukushima Effect: Explaining the Recent Resurgence of the Anti-nuclear Movement in Taiwan."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3 (6): 965-983.

Ho, Ming-sho. 2015. "Occupy Congress in Taiwan: Political Opportunity, Threat and the Sunflower Movement."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5 (1): 69-97.

Hsiao, Hsin-huang Michael. 2001. "Socio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Taiwan since the 1980s." In *Taiwan's Economic Success since 1980*, eds. Chao-cheng Mai, and Chien-sheng Shih.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Hsieh, Jolan. 2006. *Collectiv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Identity-Based Movement of Plain Indigenous in Taiwan*. New York, NY: Routledge.

Huang, Chang-ling. 2003. "The Politics of Reregulation: Globaliza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Taiwanese Labor

- Movement.” *Developing Economics* 40 (3): 305-326.
- Inclán, María. 2012. “Zapatista and Counter-Zapatista Protests: A Test of Movement-Countermovement Dynamic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9 (3): 459-472.
- Jenkins, J. Craig. 1983.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9: 527-553.
- Jenkins, J. Craig, David Jacobs, and Jon Agnone. 2003.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d African-American Protest, 1948-1997.” *Mobilization* 109 (2): 277-303.
- Jung, Jai Kwan. 2010. “Disentangling Protest Cycles: An Event-History Analysis of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Mobilization* 15 (1): 25-44.
- King, Gary, Michael Tomz, and Jason Wittenberg. 2000. “Making the Most of Statistical Analyses: Improving Interpretation and Present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4 (2): 347-361.
- Koopmans, Ruud, and Paul Statham. 1999. “Ethnic and Civic Conceptions of Nationhood and the Differential Success of the Extreme Right in Germany and Italy.” In *How Social Movements Matter*, eds. Marco Giugni, Doug McAdam, and Charles Tilly.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Kriesi, Hanspeter. 2004. “Political Context and Opportunity.” In *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Movements*, eds. David A. Snow, Sarah A. Soule, and Hanspeter Kriesi. Malden, MA: The Blackwell Publishing.

- Markoff, John. 1996. *Waves of Democracy: Social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Change*. Thousand Oaks, CA: Pine Forge Press.
- Marshall, Monty G., Ted R. Gurr, and Keith Jagers. 2014. "Polity IV Project: Political Regime Characteristics and Transitions, 1800-2013." <http://www.systemicpeace.org/inscrdata.html> (July 18, 2015).
- McAdam, Doug. 1996. "Conceptual Origins, Current Problems, Future Direc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eds. Doug McAdam, John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Adam, Doug,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1997. "Toward an Integrated Perspective on Social Movements and Revolu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Rationality, Culture, and Structure*, eds. Mark I. Lichbach, and Leo Zuckermann.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arthy, John D., and Mayer N. Zald. 1977.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 (6): 1212-1241.
- Meyer, David S. 2004. "Protest and Political Opportun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0 (1): 125-145.
- Meyer, David S., and Debra C. Minkoff. 2004. "Conceptualizing Political Opportunity." *Social Forces* 82 (4): 1457-1492.
- Myers, Daniel J., and Beth Schaefer Caniglia. 2004. "All the Rioting That's Fit to Print: Selection Effects in National Newspaper Coverage of Civil Disorders, 1968-1969." *American*

- Sociological Review* 69 (4): 519-543.
- Nam, Taehyun. 2007. "Rough Days in Democracies: Comparing Protests in Democracie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6 (1): 97-120.
- Oliver, Pamela E., and Daniel J. Myers. 1999. "How Events Enter the Public Sphere: Conflict, Location, and Sponsorship in Local Newspaper Coverage of Public Even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1): 38-87.
- Percival, Val, and Thomas Homer-Dixon. 1998. "Environmental Scarcity and Violent Conflict: The Case of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35 (3): 279-298.
- Pickvance, Christopher G. 1999. "Democratis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Social Movements: The Effects of Regime Change on Collective Action in Eastern Europe, South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Sociology* 33 (2): 353-372.
- Powell, G. Bingham. 1982. *Contemporary Democracies: Participation, Stability, and Violen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Quaranta, Mario. 2016. "Protesting in 'Hard Times': Evidence fro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urope, 2000-2014." *Current Sociology* 64 (5): 736-756.
- Roberts, Kenneth M. 2008. "The Mobilization of Opposition to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1 (1): 327-349.
- Schatzman, Christina. 2005. "Political Challenge in Latin America: Rebellion and Collective Protest in an Era of Democratization."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42 (3):291-310.

Silver, Beverly J. 2003. *Forces of Labor: Workers 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nyder, David and Charles Tilly. 1972. "Hardship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France, 1830 to 1960."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7 (5): 520-532.

Tarrow, Sidney. 1996. "States and Opportuniti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 eds.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omz, Michael, Jason Wittenberg, and Gary King. 2003. "Clarify: Software for Interpreting and Presenting Statistical Results. Version 2.1. Stanford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nd Harvard University." <http://gking.harvard.edu/> (June 8, 2015).

Van Dyke, Nella. 2003. "Protest Cycles and Party Politics: The Effects of Elite Allies and Antagonists on Student Prot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1930-1990." In *States, Par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ed. Jack Goldstone.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u, Chin-en, and Yun-han Chu. 2010. "The Dynamics of Social Protests during Taiwan'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Explaining Local Protests in Taiwan (1992-2008):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Yen-pin Su

Chin-en W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Social protest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Although many studies on Taiwan's social movements are qualitative analyses focusing on specific cases, few explain the variation in the frequency of social protests within Taiwan. To fill this empirical gap, this paper draws hypotheses from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and subjects it to empirical tests using a unique dataset of subnational protest events. First, the empirical analyses show that the frequency of local protests tends to be higher in a locality where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is in power. Secondly,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in an election year, local citizens have stronger incentives to protest. Finally, we find that the share of seats of the DPP in a locality council does not have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local protests. Overall, this study facilitat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civil society and provides important insights regarding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new democracies.

Keywords: Social Movements, Local Protests,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Electoral Cycle